中央红军长征转战綦江时旧势力的挣扎与瓦解(二)

綦走发现

中央红军长征由江西转战贵州,震动全川。据《耿飚回忆录》记载,为掩护主力部队休整、保障遵义会议安全召开,1935年1月16日清晨,由耿飚任团长、杨成武任政委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率先进驻松坎,“并负责警戒四川重庆方面来的敌人。我们把前哨一直放到二十里外的山上,从那里可以隔江看到川南的情况。”以松坎为起点、朝向重庆方向约二十里的前哨阵地,按古道里程推算,大致位于今酒店垭至羊角一带。这支前哨部队的布设,形成佯攻重庆、牵制川军的战略态势,为遵义会议筑牢北部屏障。





▲志愿者测量琵琶山残存的古寨墙。通讯员 梅艳 摄

◀地处两山夹谷之中的东溪镇。通讯员 罗琴 摄

旧势力的忧中志满

时任四川剿匪区安抚委员会宣传组代理主任刘东岩在《川滇黔剿匪从征别记》(注:文中“匪”为国民党对红军的蔑称,全文同;该书国民党方面史料,存在美化当局的表述,阅读时需加以辨析批判)中记述:在他看来,中央红军将加速进军川南,“以一部佯攻綦南,震撼重庆;一部直趋赤纳,威胁泸县;然后以大部上窜横江,俯窥宜宾。”川北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,则“一面佯攻营蓬,以威胁顺庆;一面佯窜陕甘,以牵制昭广;然后以大部进逼苍阆,强渡嘉江,以窜扰川西,直捣成都。”

在刘东岩的预判里,红军若形成这样的配合态势,“则四川军疲于奔命,兵力已分,策应为难。中央军则限于途程,追剿既艰,援救不易。”刘东岩还在书中流露出对四川统治根基摇摇欲坠的担忧:“尤可虑者,处兹危银行挤兑境,四川军民心理,自然大为动摇,当局金融信用,实属难以维持。军饷拮据,三月之内。匪计逞矣!”

不过在刘东岩视角中,川军不会坐以待毙。他对川军廖海涛旅统江津、綦江、南川三县民团的指挥调遣,给出“部署颇为周至”的评价。

为打探前线更多动向,刘东岩舍近求远,于1935年1月6日经木洞转南川赴綦江前线,抵达綦江县城已是1月9日21时30分。刘东岩随即会晤正在綦城的南川青年党骨干刘泗英,对他纠结南川、涪陵等县反动地主武装“以助军剿匪起见,尝往来仆仆於道路中,不畏艰苦,不讲毁誉……成败利钝,未暇计及”,给予了“刘君诚今之君子也”的称赞。

刘东岩的反动宣传

1月10日清晨,刘东岩从綦江县城赶往东溪镇。綦江南路防务指挥、綦习联防主任夏奠言对刘东岩的到来积极响应,以“民众力弱且多愚昧无知”为由,执意挽留刘东岩多停留几日,帮他出谋划策,并邀请刘东岩“亲临各乡镇向人民讲演共匪之罪恶,及民众自卫之方法”。

刘东岩与夏奠言一拍即合,“每常到各乡镇乘其市集之便,召集赶市民众,为之讲演匪情及民众助军剿匪之具体办法。”1月11日,他和夏奠言前往与东溪丁山毗邻的贵州习水县条台场,查勘工事筑工与布防地区域,当时“召集民众约千余人,到场外广场听讲”,可见被其蛊惑的群众规模不小。

刘东岩宣讲的内容充斥歪曲抹黑之词:“共匪罪恶,至其分散家庭,编组男女,杀戮良民,惨刑索钱。”为增加欺骗性,他还谎称:“年前曾赴川北各匪区亲察,一若身受其苦。遂不觉其言词之沉痛,其表情之真切。”由此可见,刘东岩的讲演多是捕风捉影、添油加醋、混淆是非的虚假宣传。

受蒙蔽的穷苦大众

刘东岩的宣讲极具蛊惑性,不少听众受到蒙蔽。当他“述共匪之残酷”时,“则听众咋舌惊怖”;“叙良民之遭害”时,“则听众摇头堕泪。”群众情绪被其刻意煽动,导向对立。“竟至使一般听众俱为动容,泰半泣下。”

“时有一白发老农,约在七十岁以上,其所立之地点,紧傍余之左前方,故众听余言词亦最真切。”随着讲演推进,这位老农“而叹息,而撚发,而摇头,而含泪,卒至泣下沾襟,俯首而未尝仰视者久之”。沉浸在自我感动里的刘东岩,也被现场氛围裹挟,“余观其状,亦不禁心中悽楚,匪可言宣。沉痛言词之足以感人之深也如此,初非余始料所及也。”

在东溪逗留的数日里,刘东岩颇为自得,“听众多受感动,人心以之渐安,恐慌迁逃者亦逐日减少。”此时的刘东岩以为,这场反动宣传收效显著。不难想见,当年还有不少像刘东岩一样的反动宣传者,四处煽惑,让不少群众对红军滋生出毫无根据的恐慌与敌意。

“琵琶”“牛心”万夫莫开

刘东岩南行途中,在东溪场西北约半小时里程的牛心山前端观音岩高地,观察到东溪坝子的地形:南北两山夹峙,东侧綦江河水流湍急,西侧河道收束、形成深峡,具备天然屏障。他当即指点谋划布防,称“如琵琶山与牛心山能各驻有一团兵力,则敌人即不敢进逼东溪而犯綦江”。他还援引史实:“民初护国之役,吴佩孚曾率一旅之众死守东溪,黔军卒不得逞”。在他看来,即便长征红军由南向北进军綦江县城,只要扼住琵琶山、牛心山关隘,就难以突破东溪防线。

关于琵琶山寨,清《四川綦江县续志》卷一《寨堡》记载翔实:“约周四十里。骈岩舒坠,势崭然。上有膏腴数百亩,樵汲备焉。”山寨边缘巨岩层叠,山势险峻。寨内地域开阔,良田颇多,不缺柴火和水源。志书还记有战例:“同治甲子(1864年)二月,桐匪犯顺,职员夏侯馥庭、文春田,督练张武超等坚守之。贼攻数日,不得逞以去。上铸大炮四,小炮二,大枪四十,抬枪百。”

由此可见,琵琶山既是一个可屯兵休整、自给自足、易守难攻的据点,也是能够扼控古道、驰援渝黔,进退自如的战略支点。

东溪至今流传一句顺口溜:“夏家的顶子,罗家的租子,陈家的铺子。”据夏奠言之子、原重庆二中(现已并入二十九中)退休教师夏进《“夏”说》中记述:“我们家姓‘夏侯’,可能是先人觉得复姓累赘,将‘侯’字省去。”据此推测,夏家在东溪掌握地方话语权,最迟自同治年间坚守琵琶山寨的夏侯馥庭起便已形成。

夏奠言是东溪夏氏这一代的地方主事者,结合上期文对其履历的介绍,不难看出,他对琵琶山、牛心山战略价值的认知,来自于家族渊源与军旅实践。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,他随即启动培修琵琶寨工事。

“各团甲民工之应征来寨者,日凡四五百人”,刘东岩在日记中记录了修寨的场景:“每日只计口给食,不另给工资”“各带被条锄兜,无不踊跃应征而乐於工作”。他还颇为自得:“余观此种现象,不禁大为有感。”刘东岩刻意掩盖民夫是通过保甲强征来的实情,将被迫出工的场面,粉饰为百姓主动出力阻拦红军的热烈景象。

(未完待续)

文/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



城市管理服务热线:12319 邮政投递电话:48612196 法律顾问: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 印刷:重庆华数印务有限公司 审读:一二版金方霞 三四版刘琦 校对:一二版杨静 三四版周铉